

【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DOI: 10.15986/j.1008-7192.2016.06.001

孙中山民生史观诸问题探讨

——兼与徐国利教授商榷

王海林^{1,2}, 董四代²

(1.武夷学院暨福建省统战文化武夷山研究基地,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2.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天津 300387)

摘要: 徐国利把孙中山的历史观界定为“道德取向的民本史观”是不准确的, 因为只有以社会发展的分析, 才能把握伟大人物的历史观, 民本作为一个政治范畴不能作为定义历史观。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和大同主义作为同一思想的不同表达, 他的历史观只能界定为民生史观。民生主义有现实和理想两个维度, 前者体现着对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判断的关系, 后者则有理想主义和道德价值的超越批判性, 仅仅把它理解为道德理想主义是不准确的。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评价孙中山的历史观, 才能形成对它的科学认识。

关键词: 孙中山; 历史观; 民本; 民生; 两个维度

中图分类号: K 257; D 69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6)06-0001-06

《江淮论坛》2012年第2期发表了徐国利教授的文章——《孙中山民本史观的道德价值取向初探》。该文关于孙中山历史观中对互助和道德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论述、道德和心力是社会发展中决定性因素的阐释, 以及把道德理想主义作为历史终极目标等问题进行了较充分的分析, 确实对从多重角度认识孙中山的历史观有很大启发。作者据此又提出:“孙中山的历史观可称为‘道德取向的民本史观’”。对于这种结论, 笔者很难认同, 因而愿就文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及结论谈谈自己的看法, 与徐国利教授商榷, 并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孙中山的历史观是民生史观还是民本史观?

徐国利教授说:“长期以来, 人们一般将孙中山的历史观概括为民生史观。这虽然反映了孙中山晚年历史观关注的重心, 但是难以涵盖孙中山历史观所包含的诸多内容和本质特征, 不能全面反映他对民众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 and 在社会历史发展进

程中的作用的基本认识。民本思想和精神才是孙中山历史观的核心和宗旨所在, 其历史观是一种建立在民本思想基础上的‘民本史观’。”这一结论性的看法超越了多年来孙中山民生史观是唯心论、唯物论和二元论的争论, 也颠覆了孙中山历史观是民生史观的结论。但这种判断的根据何在呢? 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判定伟大人物历史观的根据应当是他对社会发展深层矛盾的分析与把握。历史观是透过纷纭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 对其内在关系的把握。历史人物思想主张的合理性和深刻性是他历史观的体现, 是在用一种正确的方法总结历史、判断现实和对未来的设想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清晰的历史观必须能够抓住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力量 and 影响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关系, 并在这种力量发展和矛盾展开的过程中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 把当前的问题和社会主张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进行论证。

孙中山先生曾经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对人类历史进行划分。

收稿日期: 2016-10-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研究(1899-1923)”(14XKS010);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从‘礼运大同’到‘中国梦’: 中国理想社会追寻轨迹”(2013C046)

作者简介: 王海林(1980-), 男, 武夷学院暨福建省统战文化武夷山研究基地讲师,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 董四代(1947-), 男, 武夷学院暨福建省统战文化武夷山研究基地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E-mail: whl800612@163.com

从政治发展角度讲,孙中山说:“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不是用权,是用气力。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是用神权。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是用君权。到了现在的第四个时期,国内相争,人民同君主相争。”“在这个时代之中,可以说是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到这个时代,民权渐渐发达,所以叫做民权时代。”^{[1]699}他还说:“但就历史上进化的道理说,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1]703}在他看来,民权主义并非有史以来就存在,而是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才出现的历史发展要求。

从社会发展角度讲,孙中山说:“共产这种制度,在原人时代已经是实行了。究竟到什么时候才被打破呢?依我的观察,是在金钱发生之后。大家有了金钱,便可以自由买卖,不必以货易货,由交易变成买卖,到那个时候共产制度便渐渐消灭了。”^{[1]829}他把资本主义视为人与人争的时代,为了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就要在人类文明发展趋势上进入新的共产时代。他说:“这种争斗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决?必要再回复到一种新共产时代,才可以解决。……所以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1]829-830}也就是说,孙中山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从落后经过“残酷的文明”,向建立在文明的制度之上的理想社会发展的过程。

他还把人类社会发展视为从太古吃果时代进入渔猎时代,经由游牧时代到农业时代,然后发展到工商时代再走向新的时代的过程。

概括和判断一种历史观必须从论者的原意出发,而不能不顾论者本人的论述任意为它定性。孙中山在论及民生主义时说:“我们国民党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能够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1]830}在谈到社会发展的动力时,他又说:“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1]817}因而,徐国利教授提出:“孙中山的历史观本质上说并非是一般所说的‘民生史观’,而是‘民本史

观’。”笔者认为,对历史人物历史观的界定和分析虽然可以透过他对相关问题的分析,把握其内在的思维理路,进而把他对历史的根本看法揭示出来,并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评价这种依据这种历史观提出的历史命题向现实转化的必然性,但不能离开他本人的相关论述去另做分析。孙中山本人对历史发展及其动力的分析论述已经相当明确,那就是民生既是历史发展的核心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而对孙中山历史观的分析也应按他本人所标识的内容展开,没有必要再对这一问题进行新的概括和界定。

二、民本主义是一种政治文化,不能成为历史观的基础

“民本”是一个政治性概念,孙中山本人很少使用这一术语。他强调更多的是民权,但他对民权的阐释并非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那样,认为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他说:“推到进化的历史上,并没有卢梭所说的那种民权事实,这就是卢梭的言论没有根据。”^{[1]703}他虽然说过:“根据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来讲,如果应用民权,比较上还是适宜得多。所以,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尧舜的政治,名义上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所以孟子总是宗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年以前已经早想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还以为不能做到,好象外国人说‘乌托邦’是理想上的事,不是即时可以做得到的。”^{[1]701}他在这里所说的“民权”,实际上就是民本。这又并不表明其历史观是民本史观,而是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寻求民权主义的文化资源。

从根本上讲,民本所表达的是一种政治诉求。它既有一种颠覆专制主义的潜能,又可以成为向民权政治转化的文化资源。但是,政治上的诉求并不能成为一种历史观的基础。孙中山对自然进化和社会进化进行区别,强调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主张发挥政治力和经济力;对民族和国家进行区别,

认为“王道”顺乎自然而形成民族，国家是“霸道”，即武力形成的团体，提倡以民族主义挽救中国的危亡。这在实际上都是强调自然与社会、社会与政治是一种原生和派生性关系，坚持以社会为本分析历史发展。因此，把他的历史观视为民本史观是不符合孙中山本人的思想的，也是不正确的。作为一种历史观，民生主义体现了孙中山对人民的关怀和以人民为本位的价值观。这无疑是受到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但并不表明他的历史观是民本史观，更何况民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诉求也不能成为一种历史观，而只能是民生史观的派生物。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民本与民生也有一定的区别。这两种思想虽然都是由孟子明确地提出来的，但前者强调的是民是国家之本，也就是“民贵君轻”；而后者强调的是要为民制产，使人们有恒产亦有恒心，解决好老百姓的生计问题。梁启超说过：“我先民极知民意之当尊重，惟民意如何而始能实现，则始终未尝当作一问题以从事研究。故执政若违反民意，除却到恶贯满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时更无相当伪制裁之法。”^{[2]3619}至于民生问题，梁启超则把它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说：“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3]2984}孙中山也说：“‘民生’二字为数千年已有之名词。”^{[4]397}只是后来民本思想成了封建专制的对立物，民生思想成为封建社会里改革家的根据和社会变革中提出的新历史要求。

在唯物史观看来，社会物质生活变化是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判定一个人的历史观也应看他对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见解，或者是把精神的力量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之源，而不应当以政治上层建筑中的理念作为历史观。当然，孙中山的历史观也不是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或二元论的简单判断中就可以全面揭示出来的，它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方面的表达。正如徐国利教授所说：“孙中山对历史发展的动因和决定力量做过不同的表述，包括心理、精神、道德、人格、知识、主义、政治、民生、生存等因素。这些范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社会历史的诸多方面，以至于人们在判定其历史观根本属性时产生了唯心与唯物、一元、二元或多元的分歧和争论。”定性判断是把握孙中山

历史观的根本前提，它涉及到从他对历史和现实的评论、解说以及在预见未来中提出的思想观点中能够看到什么和朝着什么方向丰富、发展和转变。但进行简单的定性判断或以为有了这种定性判断就能决定对它的取舍，并不能揭示出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只有从多重视角上，从不同侧面对它进行解读，才能更全面地、历史地认识孙中山历史观的内涵，以及据此提出的各种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讲，徐国利教授从道德视角对孙中山历史观进行分析，就使我们对孙中山的历史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但笔者又不能认同徐国利教授得出的结论：“孙中山在谈到历史发展的根源动力和决定力量一类问题时，主要是指向道德性因素和力量的。”

三、如何认识孙中山的社会理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徐国利教授说：“孙中山晚年开始将民生主义作为世界大同的内涵，指出大同之世即民生幸福的太平之世，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实，早在20世纪初，早期国民党人马君武就以大同主义指称社会主义；在《民报》时期孙中山领导的早期国民党人与梁启超进行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廖仲恺等人就以大同论证社会主义。孙中山本人至迟在1912年就已经说过：“社会主义之国家，人民既不存尊卑贵贱之见，则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5]364}只不过在那时他没有对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系统的论述。

一个伟大人物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形成巨大的魅力，不仅在于它能够对现实做出判断，而且在于这种判断包含了对传统的创造性破坏，并对其内核的揭示和发展，以及在对未来的追求中体现出来的超越性批判精神。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不是对历史上形成的诸多思想观念的延续，而是批判制度化了的儒家思想，从先秦中华文化原创期的各家思想和在封建社会边缘化了的思想中寻求资源。他说过：“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5]345}冯自由在论及民生主义的时候也说：

“抑民生主义之滥觞于中国，盖远在希腊罗马之文明以前矣。三代井田之制，人皆授田百亩。分配公平，后世以为至治。特井田不过平均地权之微意。未足以包括民生主义之总体。是则不无大小之区别耳。三代以后，行之者未尝无人。王莽新制，国人不得自名其奴，且不得自名其田，尤民生主义之精理。……太平天国之役，满军破苏州及金陵时，设有天军特设利民之公仓。满军因是腰缠十万，满载而归，公仓亦民生主义之一端也。由是观之，民生主义实为中国数千年前固有之出产物，诚能发其幽光。而参以欧美最近发明之新理，则方之欧美，何多让耶。”^{[6]637}孙中山推崇“礼运大同”，并手书“天下为公”示人。其实大同理想也并非儒家之作，而是虽出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又是集先秦儒墨道各家理想追求于一身的中国传统理想的最早系统表达。其中包含的儒家仁爱精神、墨家泛劳动主义和互助精神、道家超越批判精神都为孙中山继承和发扬，并镕铸到了他的理想主义追求和三民主义的构想之中。孙中山更强调民生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他认为贫富不均、巧取豪夺古已有之，然而“因为机器发明以后，经过实业革命，成为社会问题，便发生社会主义。”^{[1]805}为此，他把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相对接，进而提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802}这种与对资本主义判断相联系的大同主义，就不仅是道德价值为取向进行立论，而是包含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并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他称马克思的学说为“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同时又说：“他照经济原理作透彻的研究之后，便批判从前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不过是有个人的道德心和群众的感情作用；其实经济问题，不是道德心和感情可以解决得了的，必须把社会的情况和社会的进化研究清楚了之后，才可以解决。”^{[1]809}因此，徐国利教授得出的结论：“孙中山的大同世界观是一种伦理本位和道德理想主义的历史发展目的论，它吸收了中国儒家的仁爱思想和大同学说，又融合了近代西方自由、平等的政治思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特别是他晚年以民生主义的实现来阐述大同社会的内涵，既反映出中国儒家史观的道德精神，又有时代的新内涵，鲜明展现了其历史观的道德价值取向。”就显得过

于一般而值得商榷了。

一个民族的生命力体现它在社会变革中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能力，这种转化不仅体现在人们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使之形成面向未来的精神，而且也决定着对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孙中山把社会主义追求、民生主义选择与传统理想向现代的转化联系起来，首先是因为他对现代文明发展的方向有明确的认识。这并非只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也并非仅仅是以道德价值为自己的民生主义立论。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没有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怀，而是说不能把他的历史观定位在“道德取向的民本史观”。

四、怎样解读孙中山的民生史观？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受意识形态上教条主义简单化的影响，我国学界不少人在研究孙中山的历史观时，精力主要集中在了对其定性的问题上。这样，就使孙中山历史观中所包含的许多深刻内容和积极思考没有被揭示出来。而如果没有这些深刻的内容和积极的思考，仅仅在定性上进行判断，也就无法把握孙中山历史观的时代性、创造性和局限性。

凯伯尔说过：“好比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根，一种原则总是潜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原则相互联系，以一个基本原则为共同的根基；在此基础上，我们系统地、合乎逻辑地建立起具有指导作用的思想观念的整个体系，这个思想观念的体系就是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7]18-19}历史观为人们认识历史和现实提供一种至高无上的原则，以回答现实世界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并抓住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式找到其内在的决定性力量，为人们的实践树立起一个奋斗的目标，并合理地处理各种关系。新的历史观既是对历史上积累下来的许多问题的破解，又能在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寻求现实问题的根源和未来走向，以新的理论视角为人们提供认识问题的方法，并为人们的思维方式转变和创造性发挥提供新的实践空间。

孙中山曾对民生下过一个定义，“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1]802}他除了强调民生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和政治、经济、历史活动的中心以外，还说：“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

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进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像阶级战争和工人痛苦，那些种种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1]835-836}以此为根据，他把民生问题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认为：“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所以我用民生主义来替代社会主义，始意就是在正本清源，要把这个问题的真性质表明清楚。”^{[1]805}但他又认为民生主义是用来打破不合理的制度，按照共产主义的目标建设人人幸福的新社会。他说：“主义是什么呢？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大凡人类对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1]616}也就是说，主义及其包含的思想和信仰在历史发展中同样有重要的作用。

孙中山说过“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1]75}，不认为物质是历史发展的重心，认为生存才是社会的心。而民生问题就是生存问题，社会之所以有进化，并不在于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而在于大多数人的利益相调和。就此而论，把民众生存问题视为历史发展的根本问题，使他对资本主义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制定实业计划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政策。把主义、理想、信仰视为社会进步的力量，又使他重视道德、修身、心理、良知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孙中山的历史观包含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个维度，前者使他把握人类文明趋势中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人民幸福的问题；后者则使他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认同社会主义，提出民生主义，并把道德进步视为社会进步的力量。在这其中又包含了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西方与东方、工具理性与文化价值等多方面的关系。由于他没有把实践引入自己的历史观，也就无法把这多重关系统一起来，并由此造成了人们对他的历史观的不同解读。

孙中山先生身后，国民党内不同政治派别都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阐释孙中山的历史观和思想遗产，就造成了不同的政治倾向。其中，戴季陶把孙中山的思想儒家化，周佛海和萨孟武把三民主义技术化，邓演达把三民主义平民化。其中戴季陶的

儒家化阐释又成为国民党正统派的理论根据，戴季陶在阐释孙中山哲学思想时的一个明确观点就是：

“先生的全人格，仁爱为其基本，一切表现无不仁爱。有过人之智，而其智惟有益于仁；有过人之勇，而其勇惟有益于仁。可知离却仁爱，绝无革命可言。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其他一切道德，皆不外由此派生，完成仁爱之用而已。”^{[8]30}然而，正是这种道德化的解释，为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提供了理论根据。因为道德上的诉求往往导致人治，从而开通一条走向独裁专制主义的道路。

徐国利教授从道德的角度对孙中山的历史观进行解读并不能与当年的戴季陶相提并论，从学术上讲，即使是戴季陶的解释也揭示了孙中山思想的道德内涵，我们也不能“因其爱而增其美，因其恨而增其恶”，必须把论题置于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中。

人们对孙中山的历史观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判断和见解，但他提出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却表达了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毛泽东当年说：“共产党员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理论，研究如何使三民主义具体地见之实施，研究如何用正确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大众，使之由了解而变为积极的行动。”^{[9]184}随着历史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三民主义仍然是理论工作者的任务。

参 考 文 献

- [1] 孙中山. 孙中山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2] 张品兴. 梁启超全集:第六册[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3] 张品兴. 梁启超全集:第五册[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4] 黄彦. 孙文选集:下册[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 [5] 黄彦. 孙文选集:中册[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 [6] 冯自由. 冯自由回忆录:下[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 [7] 大卫·K·诺格尔. 世界观的历史[M]. 胡自信,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8] 张军民. 对接与冲突——三民主义在孙中山身后的流变[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 [9]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M]. 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

(下转第25页)